



香港亞太研究所

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 後過渡期香港人的經驗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063-1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

後過渡期香港人的經驗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 王家英 1997

ISBN 962-441-063-1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

後過渡期香港人的經驗

引言

隨著政治民主化的開展及「九七回歸」的臨近，香港的政治文化近年出現了兩方重大的變化。首先，民主化使香港的政治文化逐漸突破了過去精英政治（elitist politics）的窠臼而展現出越來越多大眾政治（popular politics）的面貌。¹所謂大眾政治，主要是指以平等的、同質的公民（citizenship）為基本單元，透過現代民主政治形式（如定期性普選）而達到的一種大眾政治參與（ma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²換言之，公民既是大眾政治的前提，也是大眾政治的產物：公民的平等參與使大眾政治成為可能，而大眾政治的發展則增加公民的自我意識和自主意識。更重要的是，大眾政治與公民意識的循環互動，會催生和強化一個以公民與公民之間彼此認同為基礎的、具高度自主性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³公民的意思，就是政治共同體內成員對公共生活的平等參與；而公民意識，就是對這平等參與的自覺。⁴香港八十年代初逐步啟動的政治民主化所帶來的一個重要政治文化現象，便是公民意識的醒覺和由此醒覺促動的以香港公民為本位的政治共同體的尋求。

其次，「九七回歸」同時使香港的政治文化面對從英國殖民統治過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問題。⁵ 由於英國殖民地公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公民是兩個不同的政治身份，在非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過程中，香港市民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種種因所屬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改變而來的身份調整的障礙與困惑。還要複雜的是，由於這非殖民地化過程與香港的政治民主化也就是香港本土政治共同體的發展同時並起，互為激盪，對本土政治共同體的追尋勢必與回歸中的中國民族國家形成不同程度的緊張與摩擦。

對於上述香港政治文化的兩種變化，儘管本地學者已先後進行過一些零星的研究，⁶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仍沒有任何研究將二者之間的關係作出探討、分析。既然公民意識的發展與民族認同問題的浮現是香港近年同一政治過程的產物，釐清二者之間的關係自然更有助於我們掌握有關問題之本質。

本文旨在探討主權轉移前夕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狀況和民族認同狀況，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文中的資料，主要來自一項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因此除特別註明外，文中所援引的數據，均直接來自該調查結果。⁷

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

一般而言，在以民族國家為主要組織原理的現代世界中，公民意識的孕育與發展往往離不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而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極重要建構原理，就是能確保民族國家內成員平等參與的民主政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Liah Greenfeld 便曾指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是內在地互為聯

繫的，離開這聯繫，任何一方均難以得到充份的認識。民族主義是民主政治出現於世界的形式，它蘊含於民族的理念之中，就如蝴蝶之藏於蛹繭。」⁸ Greenfeld 這裏所謂的民族主義，是指某擁有相同血源、風俗習慣或文化價值等的社會群體，尋求建立一個使其成員能平等參與、互相尊重的民族國家。從政治形成看，要使民族成員平等參與、互相尊重，並進而凝聚成一彼此認同的民族國家，自然離不開民主政治的實踐，後者的具體表現，就是前述的大眾政治，而由民主政治重新塑造、平等規範的民族成員，就是公民。⁹

如果說民主政治是民族主義所追尋的一個根本目標，則民主政治的開展，也同時會催生新的民族或集體認同。對民族主義發展素有研究的 Benedict Anderson 便認為，民族主義所要成就的共同體（community），嚴格而言，並不存在於過往的歷史之中，而是存在於將來；這共同體基本上是想像的（imagined），而想像的基礎，除了共同的社會、文化、語言、血源、宗教等的特殊性元素外，更重要的還是平等的公民。¹⁰ 事實上，許多研究者發現，就民族國家的建構及穩定發展而言，具普遍性的平等公民的落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因為它是整合的、包容的，而非分化的、排他的；簡言之，公民的發展與落實本身便是民族或集體認同的一項極重要憑藉，像今天的美國、新加坡。¹¹

雖然民族國家建構是公民意識賴以開展的一個主要形式，但二者並非必然一體相連、互為承托的，也就是說，公民意識不一定是民族國家的一個函數。¹² 香港的情況正是如此。

從人類學的角度看，絕大多數的香港市民均屬於華人（Chinese）。然而，傳統的中國主要是由「差序格局」組成

的皇朝，¹³ 而不是建基於平等公民的現代民族國家。香港特別的地方，是它在傳統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之前，已割讓了給英國，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縱使那些經歷過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在一九四九年前後踏足並定居香港的華人，國共內戰的經驗，也極可能使他們的民族認同展現出各種矛盾甚至破滅的心態。¹⁴ 換言之，儘管香港市民（華人）對傳統中國仍或多或少存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或歷史認同，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經驗，迄今為止，多少獨立於他們的現實意識之外，又或是因過去國共的對立對抗而扭曲不堪。總而言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香港市民所經歷的政治現實，主要還是英國殖民統治，而非中國民族國家建構，雖然不斷從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新移民，也保有一定的中國民族國家經驗，但他們在全香港的人口中只是少數，並不能代表香港市民的主流經驗。

近代集體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殖民疆界與統治，殖民疆界帶來了疆界內人民的共同空間意識，而殖民統治則形塑了他們新的集體歷史經驗與認同。¹⁵ 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香港雖然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但當時殖民疆界的管制並不嚴厲清晰，大陸人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香港。¹⁶ 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大陸移民不斷湧入，¹⁷ 造成管治困難，加上東西方冷戰格局隨著韓戰的爆發而快速浮現，香港政府於是自一九五零年開始，逐漸將過去的「開放疆界」（open border）收緊，取而代之的是一控制較為嚴密的移民政策，¹⁸ 從此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便出現了一較高程度的政治區隔，香港市民也開始落地生根，後來所謂的「香港人」、「香港意識」或「香港文化特質」（ethos），¹⁹ 很大程度便是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慢慢形成

的。從族群發展的角度看，這種集體認同的浮現所突顯的，其實就是香港人作為一地域族群的形成，儘管這地域族群的成員均來自中國大陸，對歷史的中國以至當今政治的中國有不同程度的認同。²⁰

另一方面，對於其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英國政府也沒有任何積極的意願和行動，將之整合成為英國的平等國民，故此儘管香港經歷了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並沒有對宗主國英國產生任何明顯的國家民族認同意識。²¹ 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主要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殖民統治層與香港的本土社會始終存在著深刻的、人為的二元區隔，也就是除了政治權力的壟斷和必須的行政管理外，英國殖民統治者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基本上採取了不干預的放任政策，²² 使得香港社會長期處於某種「隱民族國家」的情境，而香港人也因此對現代人習以為常的民族（國家）認同產生了某種模糊的、可有可無的心理。

雖然如此，經濟和文化上的不干預政策畢竟與現代平等公民背後的自由主義精神相涉，²³ 而且英國殖民統治雖排除了民主政治，其行政管理大體上還是以法治為依歸，而後者也是現代公民賴以有序地參與公共生活的一個重要前提。²⁴ 換言之，儘管英國殖民地政府沒有任何計劃將香港人視為英國國民而加以培育、教化，但其在香港的特殊管治，卻意外地帶來了香港的公民意識的發展。而自八十年代初英國殖民地政府因種種原因逐步引進代議政制（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也就是民主政治之後，²⁵ 這公民意識的發展更由潛伏的狀態走向一高度自覺的追尋，各種有關公民教育的討論及推廣計劃，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²⁶ 不過，必須指出，香港公民意識的發展，主要還是在某種「隱民族國家」的狀

態中進行的，直到近年，英國民族國家和中國民族國家也不是公民認同的主要對象，甚至在「九七」問題浮現十多年後的今天，有關未來香港公民教育與中國民族國家教育之間的關係仍不斷引起爭議。²⁷ 只有明瞭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掌握到研究香港市民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二者之間的關係的重要性。明顯地，香港市民近年公民意識的發展，已再不可能繼續過去的「隱民族國家」模式，而是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民族國家的整合。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無意繼承英國殖民政府的「隱民族國家」政策；相反，它希望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能認同中國，特別是在政治上。²⁸ 如此一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的發展如何與其中國民族國家認同銜接，便成為不可迴避的課題。

無論如何，先讓我們回頭看看當前香港人的公民意識狀況和民族認同狀況。

香港人的公民意識狀況

如引言所說，公民的意思，就是政治共同體內成員對公共生活的平等參與，而公民意識，就是對這平等參與的自覺。在研究上，社會科學家往往會將公民意識分為三個互為關連的層面，即認知（cognitive）的層面、態度（attitudinal）的層面和行為（behavioral）的層面。²⁹ 在探討香港人的公民意識狀況時，我們也按照這三個層面進行。

公民認知

所謂認知，主要是指社會成員對公民意涵的一些基本理解和對處身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認識程度。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³⁰ 我們只集中於前者，特別是詢問被訪者心目中最重要

的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蓋公民權利和責任，是構成公民存在的最重要基礎，而詢問他們心目中最重要公民權利和責任，則既可瞭解到不同人士對個別公民權利和責任的認知，又可同時掌握主流民意如何定位當時公民權利和責任的發展需要。

表一顯示，當被問及他們認為甚麼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時，被訪者的答案遍及現代社會各種各樣的公民自由和權利，可見香港市民對其作為現代公民所應擁有的權利的認識，已相當廣泛。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被訪者中，超過一半（51%）給予的答案是「享有各種自由」，然後才是「享有民主權利」、「享有各種人權」和「享有各種社會福利權利」等。顯而易見，香港市民特別強調自由，這大概由於自由一方面乃他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擁有、得到保障和特別珍惜的，另一方面卻因香港九七主權轉移而可能遭受種種壓制，故此對它倍加重視。這一點，可從另一條問題得到證實：當被問及面對「九七回歸」最憂慮些甚麼問題時，有 51.9% 的被訪者的答案是與失去自由有關的（如沒有自由、沒有人權、沒有民主、政府專制、沒有法治等）。不僅如此，當被問及在維護自由人權和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之間，何者重要時，有 52.7% 的被訪者回答「自由人權」，回答「國家民族」的只有 17.1%，另有 22.4% 回答「兩者都重要」，0.2% 回答「兩者都不重要」和 7.6% 回答「不知道／不清楚」。就這一點看，香港市民對自由人權無疑相當重視，而且遠超於對國家民族的重視。不過，必須注意，在同一條關於甚麼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的問題中，也同時有 33% 的被訪者回答「不知道／不清楚」，多少意味有不少香港市民對公民權利的自覺仍不夠強，仍需進一步開拓和深化。

表一：最重要的公民權利

最重要的公民權利	頻數	百份比
享有各種自由	633	51.0
享有民主權利 / 投票 / 選舉權 / 被選舉權	81	6.5
享有各種人權	70	5.7
享有各種社會福利權利	39	3.2
其他	7	0.5
不知道 / 不清楚	409	33.0
拒絕回答	1	0.1
總計	1,240	100.0

對於公民責任的認知，被訪者的答案也相當廣泛，遍及政治、社會、經濟以至國家（中國）等各個層面（參看表二）。不過，對於哪一種公民責任最重要，被訪者的看法便較為分歧，並沒形成任何重要的共識，最多人回答的是「做好自己本份」，也只有 14.4%；其次是「遵守法律」，有 13.3%；再其次是「服務社會／關心社區」，更少至 8.1%。如此分歧的原因，可能是公民的責任原本就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公民自己自動履行的，因此極容易因他們認知角度的不同而出現較高的分殊現象。還有，回答「不清楚／不知道」的高達 45.1%，假若這不是因為公民責任太過分殊，不易辨別輕重，則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反映出香港人對公民責任仍處於一定的模糊狀態。³¹

若將被訪者對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的認知結合一起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香港市民對公民權利和責任已有相當

表二：最重要的公民責任

最重要的公民責任	頻數	百份比
做好自己本份	178	14.4
遵守法律	165	13.3
服務社會 / 關心社區	100	8.1
投票 / 選舉	75	6.0
交稅	37	3.0
維持治安	37	3.0
保衛自由人權	26	2.1
幫助中國發展	13	1.0
維持香港政治穩定	12	1.0
維持香港經濟繁榮	11	0.9
其他	24	1.9
不知道 / 不清楚	559	45.1
拒絕回答	3	0.2
總計	1,240	100.0

廣泛的認知，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對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的認知較清晰和一致，而對最重要的公民責任則較模糊和分歧，顯示出在後過渡期的最後階段，香港市民對他們不易控制的自我權利，存有較高的警覺性（憂慮）。

公民態度

公民態度乃指公民對其處身的社會政治環境（包括人物和制度）和對他們作為公民本身如何判斷、看待。為此，我們選擇了七項指標對香港市民的公民態度進行觀察，由於香

港作為一公民平等參與的政治共同體仍在發展當中，政治層面較為突出和重要，因此我們在選擇指標時也特別集中於政治層面，儘管我們也清楚知道公民態度的意涵並不僅止於政治層面。表三臚列出被訪者對這七項指標的看法。

首先，與過去的研究發現相若，³² 香港市民對香港的政治發展持有較負面和較悲觀的看法。有 45.5%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26.4%；有 82.8% 同意／十分同意「政治是很複雜的，不是這麼容易明白」，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10.1%；有 72%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未來都已經被中英兩國政府所決定，香港怎樣爭取都改變不了現實」，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19.2%；有 65.1% 同意／十分同意「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並無甚麼影響力」，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24.1%。

其次，儘管香港市民對香港的政治人物及政治現狀持有較負面和較悲觀的看法，但對於自八十年代初引進的民主選舉，他們卻表現出相當的肯定。有 61.3%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28.6%。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肯定民主選舉的正面性的同時，香港市民對於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卻表現出分歧的態度：有 37%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目前香港政治的民主程度已經足夠」，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則有 44.6%。無疑，認為香港民主程度不足夠的被訪者較認為足夠的多了數個百分點，但並沒有取得大多數的地位，顯示當前香港社會對民主政治發展並沒有強烈一致的迫切感，這與近年相關研究的結果相契合，從而反映出香港市民政治態度溫和及保守的一面。³³

表三：公民態度 (%)

公民態度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 不清楚
一：香港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N=1,225)	1.0	25.4	20.1	40.7	4.8	8.0
二：政治是很複雜的，不是這麼容易明白 (N=1,229)	0.5	9.6	3.7	72.4	10.4	3.4
三：香港的未來都已經被中英兩國政府所決定，香港人怎樣爭取都改變不了現實 (N=1,230)	0.9	18.3	4.6	63.4	8.6	4.1
四：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並無甚麼影響力 (N=1,227)	0.9	23.2	5.8	58.8	6.3	5.1
五：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 (N=1,223)	1.9	26.7	6.3	58.4	2.9	3.9
六：目前香港政治的民主程度已經足夠 (N=1,209)	2.7	41.9	9.8	35.3	1.7	8.5
七：香港人自己已有足夠的能力管理好香港 (N=1,210)	0.4	12.4	4.4	72.8	5.4	4.6

最後，必須指出，雖然香港市民對政治人物和政治現狀等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但作為政治的主體，他們還是具有十分正面、十分一致的看法：有高達 78.2%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管理好香港」，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2.8%。

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是公民意識的一個極重要組成部份，因為它是指社會成員以行動體現其作為公民的本質。我們對香港市民公民參與的觀察分為三部份，一是對時事的關心，二是對社會義務工作的參與，三是對政治的參與。關心時事被視為公民參與的一部份，主要是觀察和瞭解時事的發展本身，便是一種行動，而這行動也是公民作出進一步的具明確社會政治目標的行動的重要參考和依據。

在對時事的關心方面，我們向被訪者詢問了他們讀／聽／看新聞的頻次和實際與人討論時事問題的頻次。表四顯示，香港市民對新聞時事頗為關心，回答「經常」讀／聽／看新聞的被訪者有 69%，回答「偶爾」的有 29.1%，而回答「完全沒有」的僅有 1.9%。平情而論，這是一些頗為不錯的數字，反映出香港市民對其身外發生的事物具有一定程度的關注。在關注以外，香港市民也頗熱衷於討論，有 64.6% 的被訪者表示「偶爾」與人討論時事問題，表示「經常」與人討論的有 8.6%，儘管同時也有 26.8% 表示「完全沒有」與人討論。

相對於對新聞時事的關注，香港市民在參加社會義務工作上顯得並不積極，僅有 2.4% 的被訪者表示「經常」參加社區或社團的義務工作，表示「偶爾」參與的有 16.7%，而表示「完全沒有」參與的則高達 80.9%。

表四：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	完全沒有	偶爾	經常
一：讀／聽／看新聞頻次 (N=1,240)	1.9	29.1	69.0
二：與人討論時事問題頻次 (N=1,240)	26.8	64.6	8.6
三：參加社會義務工作頻次 (N=1,240)	80.9	16.7	2.4
四：參加遊行示威頻次 (N=1,240)	85.4	14.3	0.3

關於政治參與，我們特別集中於觀察他們過去的投票紀錄和參加遊行示威的頻次。當被問及在過去有否在任何選舉中投過票時，有 53.6% 的被訪回答「有」，回答「沒有」的有 43.1%，而拒絕回答或不適用的有 3.2%。³⁴ 這些數字只能算是強差人意，因為香港推行三級議會選舉已超過十年，但仍有四成多的被訪者完全沒有在選舉中投過票，這多少顯示香港市民對政治參與仍欠缺積極性，而且與前述他們大多傾向肯定投票的正面性有所落差，說明了香港市民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香港政治學者劉兆佳和關信基所稱的「關注的旁觀者」的階段。³⁵ 不過，隨著民主政治的開展，在投票以外，也有不少香港市民採取了現代民主社會慣常的政治參與模式：遊行示威。有 14.3% 被訪者表示「偶爾」會參加遊行示威，表示「經常」的有 0.3%，而表示「完全沒有」的有 85.4%。

若進一步察看被訪者的人口背景（demographic background）與他們的公民意識之間的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見表五），有數點值得我們留意的地方：（一）年齡幾乎與所有公民意識的指標存有統計學上顯著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關係，而且強度大多不弱，十一項顯著的關係中，有七項的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超過 0.1。就這些關係細加分析，明顯地，年齡較輕的被訪者較重視自由人權，對公民責任有較清晰的認識，對政治持有較負面和悲觀的看法，和表現出較強的公民參與（投票除外，這可能與投票年齡有所規限有關）。³⁶（二）與年齡相似，教育程度也幾乎與所有公民意識的指標存有顯著的關係，而且強度依然不弱。這些顯著的關係呈現如下的特色：教育程度高的被訪者較重視自由人權，對公民責任有較清晰的認識，對政治持有較正面樂觀的看法，和有較高的公民參與。（三）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市民較強調自由人權。（四）收入和性別雖與少數公民意識的指標存在顯著的關係，但相關性不強（相關係數均在 0.1 以下），顯示這兩個變項並非影響公民意識的重要因素。

綜合地看，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並不算弱，但展露出頗獨特的內涵：他們對公民權利和責任有頗廣泛的認識，但對自由似乎情有獨鍾；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和民主選舉的正面性有頗高的評價，但對政治人物和香港政治現狀卻表現得頗為負面和無奈；他們頗關注社會時事的發展，但對於落實為行動參與並不十分積極。此外，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市民展現出較強的公民意識，他們特別重視自由人權，也較瞭解公民責任，而且展現出較高的公民參與。由於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和在香港出生的人士主要

表五：公民意識與人口背景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年齡	教育程度	收入	性別 ^g	出生地 ^h
公民權利 ^a	-.1052*	.1957*	-.0054	.0345	.1132*
公民責任 ^b	-.0662*	.2592*	.0518	.0924*	.0717*
自由人權 / 國家民族 ^c	-.1175*	-.0323	-.0820	-.0585	.1623*
公民態度一 ^d	.0059	-.0324	-.0296	.0142	.0319
公民態度二	.1324*	-.1835*	.0140	-.0731*	-.0559
公民態度三	.1508*	-.1875*	-.0690*	.0597*	-.0547
公民態度四	.0514	-.1168*	-.0440	.0170	.0176
公民態度五	.0595*	-.0778*	.0092	.0067	-.0768*
公民態度六	.0083	-.0480	.0130	-.0433	.0083
公民態度七	.0632*	-.0892*	-.0569	.0350	.0632*
公民參與一 ^e	.0053	.1737*	-.0181	.1053*	.0285
公民參與二	-.1200*	.2775*	-.0031	.0767*	.0825*
公民參與三	-.0910*	.1271*	.0682*	.0061	.0485
公民參與四	-.1020*	.1483*	-.0018	.0499	.0621*
投票紀錄 ^f	.1213*	.0187	-.0173	.0464	.0445

*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a. 公民權利之量度為 0 = 所有非「享有各種自由」之答案（拒絕回答除外），1 = 「享有各種自由」，下同。

b. 公民責任之量度為 0 = 「不知道／不清楚」，1 = 所有非「不知道／不清楚」之答案（拒絕回答除外），下同。

c. 自由人權／國家民族之量度為 0 = 國家民族，1 = 自由人權，其餘的答案當缺值論，下同。

d. 公民態度一至公民態度七代表表三列出的公民態度問題次序；而其量度由 1 = 十分不同意至 5 = 十分同意，下同。

e. 公民參與一至公民參與四代表表四列出的公民參與問題次序；而其量度由 1 = 完全沒有至 3 = 經常，下同。

f. 投票紀錄之量度為 0 = 無投票，1 = 有投票，其餘的答案均作缺值論，下同。

g. 性別之量度為 0 = 女，1 = 男，下同。

h. 出生地之量度為 0 = 香港以外，1 = 香港，下同。

屬於戰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經歷香港社會快速現代化和本土化的大多數民眾，因此他們展現的較強烈的公民意識，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香港公民社會的漸趨成熟化。

香港人的民族認同狀況

民族認同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牽涉到個體對民族國家這文化與政治的複合體的特殊經驗，並從這經驗中生起不同程度的、自然化的（naturalized）、與這複合體合而為一（identification）的感覺與感情。³⁷ 由於民族認同最少包含了歷史文化的「民族」層面和政治的「國家」層面，³⁸ 我們選擇指標作出觀察時，也盡量照顧到這一點。

從表六中，我們可以得出最少五點發現。首先，香港市民對中國歷史文化有相當不錯的認同：有 65%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長、文化深厚，很值得我們驕傲」，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7.5%。其次，香港市民對香港回歸中國主權並沒有明顯的抗拒，而且對幫助中國大陸的發展大多感到理所當然：有 61.3%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在九七主權移交當日，香港人應該隆重慶祝」，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28.6%；有 77.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人應該多參與和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1.8%。其三，香港市民大多樂意加強對祖國的認識：有 75.3%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學校應加強關注中國的國家民族教育」，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0%。其四，香港市民對中國的政治狀況很不滿意，並且對中國政府也沒有甚麼信心：有 72.6% 的被訪者不同意／十分不同意「中國的政治狀況如民主自由等令

人滿意」，同意和十分同意的只有 8.9%；有 60.6% 的被訪者不同意／十分不同意「中國政府值得信任」，同意／十分同意的也只有 11.6%。其五，香港市民對中國的認同透露出頗強烈的香港本位色彩：有 77.2%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制度相當完善，因此中國要發展，應該多學習香港的制度」，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1.1%；有 79.6%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應該先考慮香港的利益」，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0.4%。

被訪者的人口背景對其中國民族認同也明顯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見表七）。這些影響包括（一）年齡較輕的被訪者較不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較不認為需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信任中國政府，較不滿意中國政治狀況，較不支持隆重慶祝香港的「九七回歸」，較強調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和對香港存有較強烈的歸屬感。（二）教育程度高的被訪者較認為香港人應多幫助中國大陸發展，較不認為需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同意中國需要多學習香港，較強調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和對香港存有較弱的歸屬感。（三）收入對被訪者的中國民族認同並沒有太明顯的影響。（四）女性似乎對中國有較深的歷史文化認同，但同時又展現出較低的政治認同。（五）在香港出生的被訪者對中國歷史文化存有較弱的認同，較不信任中國政府，較不滿中國政治狀況，較強調香港人的身份，和對香港存有較強的歸屬感。

表六：中國民族認同（%）

民族態度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不清楚
一：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長、文化深厚，很值得我們驕傲（N=1,209）	1.0	16.5	12.5	60.7	4.3	5.0
二：香港人應該多參與和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N=1,230）	0.6	11.2	5.8	72.7	5.1	4.6
三：香港學校應加強國家民族教育（N=1,206）	0.3	9.7	5.3	68.9	6.4	9.4
四：中國政府值得信任（N=1,200）	12.1	48.5	19.7	11.3	0.3	8.2
五：中國的政治狀況如民主自由等令人滿意（N=1,203）	22.4	50.2	9.6	8.7	0.2	8.9
六：在九七主權移交當日，香港人應該隆重慶祝（N=1,217）	1.9	26.7	6.3	58.4	2.9	3.9
七：香港的制度相當完善，因此中國要發展，應該多學習香港的制度（N=1,211）	0.4	10.7	6.9	69.9	7.3	4.7
八：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應該先考慮香港的利益（N=1,210）	0.9	9.5	6.3	73.9	5.7	3.7

表七：中國民族認同與人口背景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年齡	教育程度	收入	性別	出生地
民族態度一 ^a	.2107*	-.0323	.0545	-.1260*	-.1459*
民族態度二	-.0554	.0800*	.0087	.0306	.0236
民族態度三	.0959*	-.1750*	.0052	-.1146*	-.0226
民族態度四	.1088*	-.0095	.0699*	.1020*	-.1761*
民族態度五	.1267*	.0160	-.0147	.0921*	-.1622*
民族態度六	.1124*	-.0121	-.0714*	.0773*	.0055
民族態度七	.0617*	-.2036*	-.0625*	-.0763*	-.0586*
民族態度八	.0250	-.0544	.0291	-.0561	-.0486
香港人／中國人 ^b	.1197*	.0661*	-.0018	-.0450	-.2690*
歸屬感 ^c	.1037*	-.0997*	.0428	.0177	.2470*

*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a. 民族態度一至民族態度八代表表六列出的民族態度問題次序；而其量度由 1 = 十分不同意至 5 = 十分同意，下同。

b. 香港人／中國人之量度為 0 = 香港人，1 = 中國人，其餘的答案均作缺值論。

c. 歸屬感之量度為 1 = 沒有，2 = 普通，3 = 有，其餘的答案均作缺值論。

對於女性為何對中國有較深的歷史文化認同和較低的政治認同，我們不得而知，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她們具有較強的理想主義傾向，故此對中國歷史文化這些容易受後人美化的東西較易產生嚮往，但對可直接觀察的中國現實政治較易產生不滿。³⁹ 無論如何，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在香港出生的被訪者展現出較弱的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認同，應與他們的成長經驗有關：高教育使他們傾向用務實而非民族主義

看中國，而年輕和在香港出生則表示他們欠缺對中國的直接的情感與經驗。

若將上述發現綜合一起看，我們不難看見，香港市民在民族認同上的複雜圖像：一方面，他們仍保持著對中國歷史文化頗強烈的認同，也願意幫助祖國的發展和進一步強化對祖國的認識，而且也支持香港的「九七回歸」；但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狀況和中國政府卻存有相當的保留，並傾向以香港本位定位中國。簡言之，如果一般所謂的民族認同是指對民族國家的複合認同，香港市民明顯展露出強於「民族認同」而弱於「國家認同」的傾向。還有，由於年輕的、在香港出生的被訪者均對中國「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有弱化的跡象，而這些人應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換言之，假如其他條件不變，隨著老一輩的凋零，香港市民的中國民族認同（包括民族的和國家的）很可能會進一步減弱。

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與其民族認同的關係

究意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與其中國民族認同之間存在了什麼關係呢？從表八列出的相關分析看，答案是頗為微妙複雜的，以下是一些歸納出的特點。

首先，被訪者的公民認知對其民族認同影響最顯著的無疑是其對自由的肯定：認為享有各種自由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的被訪者，較不信任中國政府和較不滿意中國的政治現狀；同時，認為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重要的被訪者，較不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較不認為香港人應該幫助中國大陸發展，較不贊成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信任中國政府，較不滿意中國政治現狀，較反對隆重慶祝香港的「九七回

歸」，較認為中國應該多學習香港，較重視香港利益多於中國利益，和較強調其香港人多於中國人的身份。尤須注意的是，上述關係的相關係數絕大部份均在 0.1 至 0.2 之間，顯示它們維持著一定的強度，進一步突顯出香港公民意識中的自由主義面向對中國民族認同的特殊制約作用，這一點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一致。⁴⁰

其次，被訪者的公民態度指標與中國民族認同指標存在了相當廣泛、強弱不一的顯著關係。這些關係包括：（一）認為「香港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的被訪者，較不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較不贊成幫助中國大陸的發展，較支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信任中國政府，較不滿意中國政治狀況，較不同意隆重慶祝香港的「九七回歸」，較強調香港利益高於中國利益，較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和對香港存有較強的歸屬感。（二）認為「政治是很複雜的，不是這麼容易明白」的被訪者，較不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較支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認為中國應多學習香港，和較強調香港利益高於中國利益。（三）認為「香港的未來都已經被中英兩國政府所決定，香港人怎樣爭取都改變不了現實」的被訪者，較不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較支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信任中國政府，較不滿中國的政治現狀，較反對隆重慶祝香港的「九七回歸」，和較認為中國應多學習香港。（四）認為「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並無甚麼影響力」的被訪者，較不贊成香港人應多幫助中國大陸的發展，較支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信任中國政府，和較不滿意中國的政治現狀。（五）認為「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的被訪者，較贊成香港人應多幫助中國大陸的發展，較不信

任中國政府，較不滿意中國的政治現狀，較反對隆重慶祝香港的「九七回歸」，和較認為中國應多學習香港。（六）認為「目前香港政治的民主程度已經足夠」的被訪者，較支持加強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較不認為中國應多學習香港，和較反對將香港利益凌駕於中國利益。（七）認為「香港人自己已有足夠的能力管理好香港」的被訪者，較不信任中國政府，較不滿意中國的政治狀況，較反對隆重慶祝香港的「九七回歸」，和較強調中國應多學習香港。

要簡括地綜合上述被訪者的公民態度與其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並不容易，但有兩點還是不難辨認的：（一）對香港政治狀況較不滿（如那些認為香港政治人物只顧私利、政治很複雜、香港的未來已為中英兩國政府所決定、香港市民對政府的政策並無影響力、香港民主程度不足的市民），或較肯定香港人自主性的被訪者，對中國民族和國家（政治）存有較弱的認同和較強調以香港本位看待中國（如認為中國應多學習香港和香港利益優先等）。（二）儘管如此，上述這些人士（除了認為香港民主程度不足者外）又大多同時較肯定強化香港的國家民族教育的必須性，這多少顯示出香港市民的公民態度只調整了其對國家民族的看法，但並有造成其對後者的根本否定。我們甚至可以猜測，由於他們已自覺到他們對國家民族認同的弱化，才會特別強調國家民族教育的必須性。

最後，被訪者的公民參與指標與其民族認同指標只存在了零星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的相關係數少有超過 0.1，反映出公民參與對民族認同仍未構成重大的影響，這也再一次印證前述關於香港市民仍維持著「關注的旁觀者」的觀察，甚至在國家民族認同的層面也沒有例外。

表八：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民族態度 一	民族態度 二	民族態度 三	民族態度 四	民族態度 五	民族態度 六	民族態度 七	民族態度 八	香港人 / 中國人	歸屬感
公民權利	.0215	.0303	.0040	-.1159*	-.1411*	-.0211	.0420	-.0340	.0215	-.0033
公民責任	.0635*	.0671*	-.0376	.0083	-.0005	.0124	-.0127	-.0289	-.0095	-.0001
自由人權 / 國家民族	-.2146*	-.1560*	-.2375*	-.2370*	-.2094*	-.2771*	.1143*	-.0724*	-.2554*	.0021
公民態度一	-.0678*	-.1148*	.1042*	-.2078*	-.1921*	-.0965*	.0053	.0642*	-.0722*	-.0951*
公民態度二	-.0667*	-.0024	.1358*	-.0213	-.0355	.0418	.1084*	.1201*	-.0104	.0515
公民態度三	-.0619*	-.0463	.1678*	-.1588*	-.1712*	-.0727*	.1654*	.0048	.0468	-.0105
公民態度四	-.0056	-.1253*	.1531*	-.2055*	-.1803*	-.0576	.0306	-.0126	.0563	-.0479
公民態度五	.0504	.0654*	.0146	-.1356*	-.1137*	-.1046*	.1354*	.0067	-.0485	.0438
公民態度六	.0005	.0477	.1913*	.0005	.0421	-.0093	-.2902*	-.0710*	-.0123	.0268
公民態度七	.0049	.0283	-.0494	-.1340*	-.1214*	-.0617*	.0945*	.0444	-.0207	.0461
公民參與一	.0178	-.0033	.0437	.0291	.0112	.0153	-.0138	.0313	-.0521	-.0615*
公民參與二	.0754*	.0387	-.0501	.0017	.0213	.0137	-.0593*	-.0432	-.0643*	-.1040*
公民參與三	-.0187	.0237	.0142	-.0212	-.0204	.0063	-.0689*	-.0287	-.0123	.0001
公民參與四	.0100	.0171	-.0335	-.0699*	-.0672*	-.0582	-.0381	-.0149	.0007	-.0243
投票紀錄	.0729*	-.0363	.0982*	-.0324	-.0538	-.0116	.0138	.0280	.0624*	.0494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結論與討論

本文探討了後過渡期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狀況和民族認同狀況，並以相關分析檢視了它們之間的關係。本文發現，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展現出頗為獨特的內涵：他們對公民權利和責任有頗廣泛的認識，但特別重視自由；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和民主選舉有相當高的肯定，但對政治人物和香港政治現狀卻表現得頗為負面和無奈；他們頗關注社會時事的發展，但對於具體的社會政治參與行動卻有點裹足不前。

至於民族認同狀況，香港市民所展現的圖像也頗為複雜：他們一方面對中國歷史文化仍表現出相當正面的肯定，願意幫助祖國的發展和進一步加強對祖國的認識，而且也支持香港的「九七回歸」；但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政府和中國的政治狀況存有相當的保留，並傾向以香港本位定位中國。這複雜的圖像多少表明，香港市民的民族認同蘊含著強於「民族認同」而弱於「國家認同」的傾向。

從我們的相關分析看，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顯得十分微妙：他們的自由意識、自主意識和對香港政治的不滿似乎都或多或少地對他們的民族認同構成負面的影響。雖然如此，這些負面的影響並沒有造成他們對中國民族認同的全面否定；相反，自由意識和自主意識較強及對香港政治較不滿的被訪者也同時較強調香港應加強國家民族教育，顯示香港公民意識的發展，充其量只使到香港市民以更理性和務實的眼光看待其國家民族問題，並沒有使他們產生民族認同的困惑。

由於相關分析又顯示，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和香港出生的被訪者對上述綜合的香港人的公民意識和民族認同狀況有較強烈的聯繫，而這些被訪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應是

日趨成熟壯大的公民社會，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若其他條件不變，上述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應會隨著香港公民社會的持續壯大和成熟化而會進一步增強，也就是說，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與其中國民族認同可能會在未來出現更深刻的緊張或摩擦，至於最終會否帶來公開的衝突，則取決於各個方面的發展而定，特別是中國的社會政治發展如公民狀況等會否逐步與香港趨同，以及中國政府能否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以減少香港的公民發展可能受到來自中國方面的干預，從而減少香港市民因公民發展受到中國的壓抑而對中國民族認同產生不必要的逆反心理。⁴¹

從過去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隱民族國家」到「一國兩制」回歸中必須以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前提，⁴²香港的公民發展已出現了一嶄新的轉向，雖然這轉向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組織單元的現代世界的常軌，但對大多數香港市民而言，這畢竟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其最終能否與中國民族認同和諧接軌，還得取決於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人民的共同努力與體諒。

註釋

1. Hsin-chi Kuan and Siu-kai Lau, "The Civic Self in a Changing Poli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Kathleen Cheek-Milby and Miron Mushkat (eds), *Hong Kong: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atio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p. 91.
2.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p. 254-64.
3. Jürgen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art van Steenbergen (ed.),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 24.

4. Bart van Steenberg,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An Introduc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p. 2.
5. Timothy Ka-ying Wong,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 Liberal Explana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2, No. 8, August 1996, pp. 105-30.
6. 參看 Kuan and Lau, "The Civic Self in a Changing Polity"; Wong,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Siu-kai Lau, "Political Attitudes," in Siu-kai Lau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2), pp. 129-57; 王家英、沈國祥, 《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全港與沙田的比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1996)。
7. 是次電話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負責籌劃及進行。此調查的抽樣方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從最新的香港住宅電話簿（一九九五年英文版）中隨機抽出 7,832 個電話號碼；為了使未刊載之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我們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為是次調查的樣本。第二步，當成功接觸住戶後，再用出生日期抽取其中一名十八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作為訪問對象。調查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每晚六時至十時進行。在 7,832 個電話樣本中，有 2,780 個發現線路有問題（包括長鳴、傳真機等）或非住宅電話，另外有 1,934 個無人接聽（經兩次不同時間嘗試）。最後成功接觸住戶的樣本數目為 3,118 個。當中有 881 個拒絕受訪，另外有 997 個無適當被訪者（例如外籍人士或沒有成人在家等等），最後成功訪問了 1,240 人。排除無適當被訪者，是次調查的成功回應率為 58.5%。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可信限度推估，抽樣誤差約在正和負 3% 以內。由於香港家庭的電話安裝率高達 99.9%，整個調查樣本應有很高的代表性。
8.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
9.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pp. 24-28.
1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pp. 6-7.
11. Greenfeld, *Nationalism*, pp. 397-484; Michael Hill and Lian Kwen Fee,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12. James N. Rosenau, "The Civic Self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J. A. Gillespie and D. A. Zinnes (eds), *Missing Elements in Political Inquiry: Logic and Levels of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pp. 157-75.
13. 「差序格局」是中國社會學者費孝通創立的名詞，意指「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和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而聯繫的機制，是具體的、因人的社會地位而有不同規範的差別性人倫秩序，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平等公民。見費孝通，〈中國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載周陽山，〈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1），頁 343-56。
14. 從政治意識形態看，國共兩黨終不免走向互相殺戮否定的戰爭，彼此之間對如何建構未來中國的民族國家各執己見，分裂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很大程度突顯了民族主義中民族的人工建構的想像特質，也符合了 Benedict Anderson 有關民族主義即「想像的共同體」的觀點。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國共之間對如何建構中國的民族國家存有重大的分歧，但就意識形態而言，所爭者無非是怎樣達到真正民主平等的中國，也就是如何可以在中國全面實現真正平等的公民。
15.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p. 163-85.
16. G. B.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4-5.
17. 據估計，單從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零年春，便有約 776,000 難民從中國大陸擁入香港，使香港社會經濟幾乎癱

- 瘼，參看 Endacott,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p. 197。
18. 同上，頁 5。
 19. 參看 Hugh Baker,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5, 1983, pp. 467-79; Siu-kai Lau and Hsin-chi Kuan,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o-king Choi, "Popular Culture," in Richard Y. C. Wong and Joseph Y. S. Cheng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37-63; Hoi-man Cha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Donald H. McMillen and Si-wai Man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43-68.
 20. Wong,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pp. 109-10.
 21. Chan, "Culture and Identity," pp. 443-68.
 22. 劉兆佳，〈《過渡期香港政治》（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96），頁 173-74；Siu-kai Lau and Hsin-chi Kuan, "Public Attitude Toward Laissez Faire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Vol. 30, No. 8, 1990, pp. 766-81.
 23. Wong,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pp. 125-27.
 24. Ambrose King, "The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Vol. 15, No. 5, 1975, pp. 422-39.
 25. 有關英國殖民政府為何引進代議政制的原因，可參看劉兆佳，〈香港的「非殖民地化」：英國對管治能力與光榮撤退的覓尋〉，《廣角鏡月刊》，第 284 期，1996 年 7 月號，頁 84-98。
 26. 王家英、沈國祥，〈《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頁 2-3。
 27. 例如，《明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八月號和九月號便特別連續製作了一個關於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討論專輯，而當中的一個主要爭議點，便是香港人的公民身份與民族身份之間的關係。
 28. 雖然中國人大一九九零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保證香港在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同時亦只強調「五十年不變」。這「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無疑有安撫香港市民之意，但它也同時透露了中國政府最終還是希望將香港逐步整合進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之內，雖然這過程相當緩長，需要最少「五十年」的時間。
 29. 參看 L. W. Milbra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 1977); Sidney Verba et 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30. 電話問卷調查不能容納太多問題，否則會對成功完成訪問造成困難，從而減低訪問的成功率和影響樣本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要較準確地量度被訪者對其處身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認識程度，無可避免地要向他們詢問多方面的問題，但如此一來，將與電話問卷調查的限制有所衝突。故此權衡之下，我們決定放棄這方面的探討，亦清楚知道這是此研究的一個不足的地方。
 31. 這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公民的發展過程，往往便經歷到從自我權利的爭取與保護的消極取向，到參與社會、改善社會的積極取向的過程。參看 Steenbergen, "The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An Introduction," pp. 2-3。
 32. 參看 Siu-kai Lau, "Declin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Political Cynicism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No. 11, 1992, pp. 3-20.
 33. Hsin-chi Kuan and Siu-kai Lau, "The Partial Vision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1995, pp. 239-64.

34. 不適用是指剛年滿十八歲，但還未有機會投票的被訪者。
35. 劉兆佳、關信基，〈關注的旁觀者：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廣角鏡月刊》，第 270 期，1995 年 3 月號，頁 66-77。
36. 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最低的投票年齡降為十八歲，之前為二十一歲。
37.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1-62.
38. 由於一般的民族認同包含歷史文化上的「民族認同」，和政治上的「國家認同」，因此在本文引用時，將給歷史文化上的「民族認同」冠以引號，以資區別於一般性的民族認同。
39. 女性這種傾向，在另一個研究中亦有相似的發現，參看王家英、沈國祥，《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頁 37-39。
40. Wong,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pp. 123-27.
41. 這種逆反心理對民族認同和民族和諧的打擊是相當明顯的，台灣四十年代的回歸經驗便是很好的例子。台灣於一九四五年從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國大陸，但由於當時中國政府並沒有妥善照顧台灣人民已有相當發展的現代公民意識，使他們很快產生了對民族認同的逆反心理，並最終在接收後的兩年，爆發了驚動中外的「二二八」民變。參看王家英，〈從殖民統治到分裂國家〉，載王家英、孫同文、廖光生編，《兩岸四地的互動整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6），頁 267-90。
42. 鄧小平便說過，「港人治港的標準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甚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見郭立民編，《中共對台政策資料選輯》（台北：永業出版社，1992），頁 609。

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

後過渡期香港人的經驗

摘要

本研究運用電話調查的方法，探討了後過渡期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狀況和民族認同狀況，並以相關分析檢視了它們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展現出頗為獨特的內涵：他們對公民權利和責任有頗廣泛的認識，但特別重視自由；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和民主選舉有相當高的肯定，但對政治人物和香港政治現狀卻表現得頗為負面和無奈；他們頗關注社會時事的發展，但對於具體的社會政治參與行動卻有點裹足不前。至於民族認同狀況，香港市民所展現的圖像也頗為複雜：他們一方面對中國歷史文化仍表現出相當正面的肯定，願意幫助中國的發展和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認識，而且也支持香港的「九七回歸」；但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政府和中國的政治狀況存有相當的保留，並傾向以香港本位定位中國。這複雜的圖像多少表明，香港市民的民族認同蘊含著強於「民族認同」而弱於「國家認同」的傾向。此外，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顯得十分微妙：他們的自由意識、自主意識和對香港政治的不滿似乎都或多或少地對他們的民族認同構成負面的影響。雖然如此，這些負面的影響並沒有造成他們對中國民族認同的全面否定；相反，自由意識和自主意識較強及對香港政治較不滿的被訪者也同時較強調香港應加強國家民族教育，顯示香港公民意識的發展，充其量只使到香港市民以更理性和務實的眼光看待其國家民族問題，並沒有使他們產生民族認同的困惑。

Civic Aware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during the Late-transitional Period**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This study looks into the issue of civic aware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during the late-transitional period; by means of telephone interviews,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ttributes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Hong Kong people exhibit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n civic awareness. Though citizens have a fairly good understanding of civic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ir particular emphasis is on freedom. They feel positively about their abilities and democratic elections, yet they feel rather negative and helpless about political figures 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current affai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re reluctant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concerned, the picture Hong Kong people present is also a complex one. On the one hand, they are quite affirmative about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and are willing to help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s well as embrace the 1997 handover of sovereignty to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They tend to look at China from their own Hong Kong perspective. This complex picture shows that, to some extent, people in Hong Kong would rather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nation than with the state.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civic awareness an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s quite intricate. Their awareness of freedom and autonomy and their discontent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 Nevertheless, such negative impact has not led them to denounce their Chinese identity. On the contrary, those who show a higher degree of awareness of freedom and autonomy also stress the need for Hong Kong to improve education on national identit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growth of civic awareness has bestowed on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 more rational and more practical insight into issues relating to the nation or the state but it has not created disorientation in their national identity.